

新文科背景下对语言学教材建设的思考*

王乐¹ 王晓涔²

(1.青岛大学外语学院,山东青岛 266071;2.吉林大学公共外语教育学院,吉林长春 130015)

摘要:新文科建设理念为我国语言学教材建设带来诸多机遇和挑战。当前我国语言学教材面临新文科系列教材规划滞后、交叉应用特色待深入、本土开发与引进失衡、数字技术赋能程度低和非通用语种教材紧缺等困境。基于新文科建设导向,今后教材建设应进一步实施精品战略,打造专门系列;优化建设体系,凸显交叉应用;坚持引育并举,加强教材外译;推动数字出版,创新教材形态;立足中外合作,完善教材类型等优化路径。新文科背景下语言学教材建设思考对落实新文科重要战略、完善语言学教材建设、助力复合型高端外语人才培养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新文科;语言学教材建设;非通用语教材

中图分类号:H3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242(2023)03-0042-05

DOI:10.13978/j.cnki.wyyj.2023.03.010

0. 引言

语言学是我国普通高等院校语言文学类专业的必修课程,旨在引导学生回顾语言发展历程,理解语言功能价值,接触国际研究前沿(王扬 2004)。作为学科内专业、系统、有效的知识传播载体,语言学教材一直处于课程的关键位置,深刻影响着教学质量与教法改革。以往语言学界对教材建设进行了诸多探索,例如,鞠玉梅(2007)指出,虽然语言学学科呈现出积极迅速的发展态势,语言学教材建设却远远不能满足学科需求。也有学者注意到教材建设的抓手作用,提出语言学教材建设应加强时代性、启发性、实用性、动态性、多媒体性和方法指导性(李克,李淑康 2008;施春宏 2010;王松 2016;Ouyang & Jiang 2019;麻彩霞 2020;Cépeda et al. 2021)。

2018年,教育部提出新文科发展战略,鼓励打破学科壁垒,积极探索建设交叉融合的新学科和新方向。新文科发展战略进一步明确了语言学的交叉学科属性,语言安全、语言服务、语言智库等新文科语言议题正成为对接新时代发展的核心方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上):英语类专业教学指南》(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2020)明确建议开设英汉语言对比、应用语言学、语言研究方法等十几门独立课程。这说明,单纯的概论类教材已不能满足新文科背景下语言学教学实践需求。教育部也强调教材建设的理念创新,要求开展新形态数字教材的开发建设。然而,现有语言学教材仍

以纸质版本为主,新形态教材建设才刚刚起步。由此可见,新文科背景下的语言学教材建设任重道远,亟需认真思考教材建设问题,以便科学推动教材建设和教学实践。本文以当当网销售以及国家图书馆中文及特藏文献数据库中收录的语言学教材数据为依据,结合当前教育生态,从建设困境和优化路径两个方面开展新文科背景下语言学教材建设思考。

1. 新文科背景下语言学教材建设困境

新文科背景下的语言学教材建设面临着五大困境:新文科系列规划滞后、交叉应用特色待深入、本土开发与引进失衡、数字技术赋能程度低和非通用语种教材紧缺。

1.1 新文科系列教材规划滞后

新文科语言学系列教材规划滞后导致新文科理念与教学实践脱节。高度市场化、编辑专业性、高校合作制等优势使得大学出版社长期承担我国高校教材出版领域的引领者与开创者角色(宗俊峰,刘志彬 2021)。新文科建设理念提出之前,大学出版社顺应时代和学科发展要求,承担了我国大量语言学系列教材的建设工作。例如,北京大学出版社“博雅语言学教材系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新编 21 世纪中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等。2018年后,新文科语言学系列教材的规划工作面临推进迟缓的困境。一方面,传统语言学理论多为西方引进,内容复杂但体系严谨,语言学专业缺乏本土人文精神与思辨理性的指导,容易陷入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的困境(刘晓嘉,范军 2022)。另一方面,当前语言学教材市场出现了同质化

* 本文为教育部社科研究项目“中国高校学生英语数字素养发展研究”(编号:18YJC740099)和山东省本科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英语+大数据’跨学科专业建设研究与实践”(编号:Z2021033)的阶段性成果。

出版物,使得高校教材出版的核心逻辑和市场结构相对固化(周粟 2020)。2022年,中国高校外语学科发展联盟课程与教材建设委员会、上海外国语大学外语教材研究院与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联合举办首届新文科背景下外语课程与教材建设高端论坛,为新文科指导下的外语教材建设提供了多角度、启发性的指导意见。同年,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组织全国20余所高校的教研骨干力量,首次规划出版“数字时代普通高等教育新文科建设语言学专业系列教材”20种。新文科理念和数字时代为此系列教材提供明确的建设思路。然而,该系列主要服务于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新文科理念下的外国语言文学系列教材建设尚待启动。这说明,新文科理念对语言学教材建设的指导功效初见端倪、亟需深入。语言安全、语言服务、语言智库等新文科语言学方向亟需开发建设相关教材,以便实现培养复合型高端语言人才的目标。

1.2 交叉应用特色待深入

语言学教材交叉应用特色不凸显,削弱了新文科理念对教材建设的指导价值。21世纪以来,我国语言学教材建设呈现出多元发展态势,但学科交叉应用特色尚不明显,具备工具特性与信息属性的语言学学科交叉潜能尚未充分激活。本研究考察的594本语言学教材中,理论类与基础教程类教材占总量的85%,这反映出当前语言学教材建设的主流仍然以理论与概论为主。虽然理论类和基础教程类教材为广大语言学学习者提供了丰富的语言理论知识,但忽略学生特点和实际需求可能会造成学习者在选择运用理论知识解决语言问题方面存在困难(杨延宁 2017),无法实现良性动态的“学以致用”。2006年教育部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学术研讨会上,国家语委多次强调语言学应用研究的重要性。本研究考察的应用类教材共63本,占总量的10.6%。新文科理念提出之前,应用类教材共出版37本,2018年以后共出版26本。方法论类教材共16本,不足总量的3%。新文科理念提出前后方法论类教材出版数量相当。这说明,应用类与方法论类教材在新文科战略提出后增速有所加快,但依旧有较大开发空间。新文科时代的语言服务方向对学科交叉应用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应用类与方法论类教材对语言应用和服务人才培养起着关键作用。同时,在注重“全人”培养的今天,教材建设应适应学科交叉能力和创新创业能力的需要,加强实验、实践、方法类教材建设,培养创新型复合人才(国家教材委员会 2020)。然而,我国语言学应用方法类教材建设尚未形成完备体系,交叉仅限于

语言学学科内部。语言学与理工科、医科等自然科学交叉的教材依然薄弱,不能满足新文科交叉应用的理念要求。

1.3 本土开发与引进失衡

本土教材开发与境外教材引进失衡的矛盾阻碍了新文科背景下中国学术“走出去”的步伐。我国语言学教材建设长期处于“引进来”大于“走出去”的状态,出版逆差明显,内外对接失衡。新文科理念提出之前,我国语言学教材出版积极响应学术“引进来”政策号召,北京大学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与国外出版社合作,引进并改编出版了诸多优秀丛书,如西方语言学原版影印系列丛书(2005)、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2014)、原版现代语言学丛书(2017)、英语国家高校语言学系列教材(2018)等,初步实现体系化引进。然而,对引进教材的监管不足为教学内容失当、价值导向偏误、中华文化失语等问题埋下隐患(苏莹莹,董希骁 2021)。2019年以来,受新冠疫情影响,语言学系列教材引进明显放慢了步伐。新文科建设强调国际国内形势的新语境对接,增强我国在国际社会的话语表达能力,培养“中国特色的文科人才”。这说明,只靠“引进来”而不能“走出去”是无法服务于国家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反观语言学教材“走出去”,虽然“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深受国家重视,但汉语本土语言学教材外译力度远远不够。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提供了世界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王伟 2019)。自2010年设立以来,语言学著作立项数量从2013年的1本增长至2021年的14本。教材类用书,只有2021年立项的《自然语言计算机形式分析的理论与方法》等少数几本,未能形成教材外译的体系。新文科背景下,语言学界强调中国语言学传统的传承发扬,本土教材外译是中国语言学研究走向世界、让世界听到中国学术声音的有效途径。因此,语言学界在中国语言学教材“走出去”的输出道路上仍需努力。

1.4 数字技术赋能程度低

数字技术赋能教材建设程度低,无法对接以数智驱动为属性的新文科时代。新文科背景下,数字技术赋能教材建设成为必然,新形态教材建设势在必行(周永健 2019)。当前数字技术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运用日益广泛,直接影响学科教材的开发趋向。然而,我国目前的语言学教材仍以纸质媒介为主。本研究考察的教材中,只有少数基础教程类教材附带数字光盘,如胡壮麟《语言学简明教程》系列。少数教材可以从网盘、电子课本网站等获得配套电子课本,如

王元新《语言学教程》等。就内容和形式来看,数字语言学教材缺乏丰富性和互动性,形式单一、用户体验弱等问题凸显,且现存的数字教材多为基础教程类纸质教材的电子复刻,系统完整的语言学数字教材并未出现。《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国家教材委员会 2020)明确提出教材编写与出版要满足互联网时代的新型学习特性。随着新文科理念的深入,中国大学慕课 APP 自 2019 年以来共上线基于语言学教材的 19 门语言学慕课,其中 17 门为概论型慕课、另有 1 门德语语言学慕课和 1 门法律语言学慕课。这说明语言学教材与慕课资源已经呈现出初步融合的趋势。然而,语言学学科目前还未形成权威、开放且持续更新的网络服务平台,语言文字安全与语言技术安全的考量还未提升到一定高度。综上,新文科背景下的语言学教材在新形态教材的程度和范围、数字技术赋能平台建设、语言文字与技术安全方面上仍有进步空间。

1.5 非通用语种教材紧缺

非通用语种教材建设滞后导致新文科理念无法辐射外国语言文学整个学科。从语言学教材所属语种来看,90%以上的语言学教材属于英语和汉语等通用语种。非通用语种语言学教材占比不足 10%,每个语种的语言学教材往往只有一到两本,缺口很大。一些语种已出现社会认可度较高的语言学教材,如《德语语言学教程》《法语语言学导论》《西班牙语语言学教程》和《日语语言学》。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意大利语、克罗地亚语等受到较高关注,众多高校开始增设相关专业,市场需求扩大。新文科理念下,非通用语种语言学教材需要整合提升。反观语言学教材市场,非通用语种的权威语言学教材出版无序化、出版力度薄弱性等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非通用语种语言学教材几乎清一色地以概论、导论为主,教材建设依然坚持传统语言学导向,形式较为单一,内容相对简单。应用类、方法类、学科交叉等类别的教材几乎空白,十分稀缺,未能满足新文科战略转向的要求,未能符合新时代语言学科人才培养的目标,较难满足国家语言能力建设与国民语言能力建设所形成的基本共识。如果缺乏相关教材,非通用语种学习者和爱好者只能借助汉语或英语教材学习语言学知识,这无疑阻碍了语言与专业素养一体化整合学习。

2. 新文科背景下语言学教材优化路径

2.1 实施精品战略,打造专门系列

打造精品、定向开发是新文科理念下语言学教材建设的启动环节。新文科背景下,我国语言学教材建设应致力于打造内容创新、体系合理、适用有效的

新文科语言学品牌教材,这需要高校和出版社各司其职、通力落实。一方面,高等院校应积极响应《普通高等学校教材管理办法》的号召,发挥自身优势与人才优势。鼓励一线教师参与研讨,积极响应配合“一带一路”倡议对语言的需求。在多元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下深入了解新文科语言学方向,如应急语言方向、语言服务方向,遴选相关素材,统筹全国资源,合作参与教材编写工作,做到精品教材的大力研发与共享(雷鸣,韩焯 2018)。另一方面,各大出版社应组织调研语言学教材内容、难易度、结构等信息,在新文科理念的指引下借助“引进+改编”,立足教材精品建设战略;尽快形成适合我国语言学学科发展的教材评估理论系统与机制,学习国外较为成熟的教材评估理论(如 Cunningsworth 1984),借鉴多元评估视角,如内部结构、外部使用、出版立场、教师学习者立场等视角(张雪梅 2019)。同时,出版社应尽快落实新文科语言学规划教材选题,在新趋势指引下丰富教材创新点的挖掘角度,最终实现新文科语言学品牌产品的打造。

2.2 优化建设体系,凸显交叉应用

完善体系、交叉融合是新文科理念下语言学教材建设的核心途径。新文科建设以学科交叉应用为特色,语言学与心理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均有交叉潜能,跨学科趋势日益显著。因此,新文科背景下,语言学教材的建设需首先坚持学科融合导向,树立全局观念,补齐短板、均衡出版,构建理论、方法、实践三位一体的教材体系,克服语言教学中“学用分离”的弊端(文秋芳 2015),实现语言人才的知识、能力与素质的全方位培养。其次,可借鉴其他类型丛书建设体系来架构语言学教材建设体系。例如,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推出了一套全国高等学校外语教师丛书,包括理论指导、科研方法、教学研究、学科发展、学术著作系列,为广大高等院校教师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方法与实践指导,也为语言学教材的建设体系提供了借鉴案例。最后,可采取“教学研究—策划出版—营销推广”一体化的教材出版模式(梁颖 2020),精准把握语言学学科的社会、政治、文化需求、交叉学科发展需求和实证研究普及需求,通过文文交叉、文理交叉和文医交叉等建立学科领地,优化新文科语言学教材的建设体系。

2.3 坚持引育并举,加强教材外译

引育并举、加强外译是新文科理念下语言学教材建设的关键抓手。一方面,我国语言学教材在“引进来”方面可继续加强本土化改造,拓展引进教材形式,纸质版与多种配套资源整合引进,为读者提供获取知识的整体资源包。另一方面,本土教材“走出去”

仍需进一步加强。21 世纪初提出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积极推动着中国文化的觉醒、整合与复兴。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走出去”被提升到国家顶层战略层面,再度创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目标、理念与方法(慕玲 2018)。作为文化传递的重要载体,语言学学科备受关注,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日益壮大。本土优质语言学教材和中国语言研究教材都是必不可少的外译项目之一。新文科建设在本质上是一种新的知识生产(范军 2021)。教材外译是新知识、价值理念、理论与实践成果的必要传播平台,走出国门是扩大传播影响、增强传播效果的主要途径之一。因此,加大中国语言学教材的外译力度势在必行。语言学教材外译可以选择内容设计恰当、文化渗透有度、市场反响较好的中国语言学教材进入外译项目;关注语言学分支学科,借鉴我国语言智库方向的研究成果,选取具有中国特色、能够贡献中国智慧的教材进行外译。另外,熟悉国外语言学教材建设前沿与市场需求,把握境外出版社的语言学教材出版分类,结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种,面向全球开展优质内容的多语种出版,做到游刃有余,有的放矢(吴迪 2020)。必须注意的是,在本土教材“走出去”的过程中,加大对语言资源安全与语言文字安全的关注,确保我国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权、发展权和传播权远离干扰、威胁与侵害。

2.4 推动数字出版,创新教材形态

数字出版、创新形态是新文科理念下语言学教材建设的重点趋势。云计算、新媒体、大数据带动数字阅读浪潮,便捷智能终端的普及方便纸质教材向数字教材的过渡。语言学教材应积极推动数字出版,加强与信息技术单位合作,关注新形态教材,如数字教材、“互联网+”教材、富媒体移动交互教材、以课程为中心的融合教材(庄红权 2020);打造立体化教材,利用多模态资源增强语言学学科内容的直观性与生动性,打破语言学学科“理论性强,抽象难懂”的思维定式,合理应对教学资源多元化趋势。出版社应积极进行市场调研,了解读者需求,参考常用语料库,借助数字技术实现理论与例证的动态互动,解决纸质教材例句滞后性的常见问题。同时,充分利用数字化教育应用平台建设数字新形态教材,如促进跨组织与平台的资源共享的 MOOC(张冰越,杨海平 2020)。当前多种语言学课程上线中国大学 MOOC 平台,如以胡壮麟主编《语言学教程》为蓝本的北京师范大学的“魅力语言学”、东北大学的“英语语言学概论”、北京语言大学的“语言学导论”。新文科语言学教材可借鉴此类成功案例,探索“纸质教材+网络慕课”的建设

模式,开发教材配套资源,如附带题库、视频案例的二维码或资源地址,实现教材的增值服务(刘超 2020)。另外,可积极利用社会化媒体开发新文科语言学教材,建设权威且持续更新的虚拟资源库。在确保语言技术安全的前提下,尝试开发语言文字学习应用程序,增强语言教育技术与教育资源管理,努力做到教材内容时新、问题解决便捷、用户体验良好与知识产权可靠。

2.5 立足中外合作,完善教材类型

中外合作、完善类型是新文科理念下语言学教材建设的必要环节。近年来我国高校外语专业发展迅速,除英语外的各语种专业呈现大幅增长趋势。“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进一步带动了非通用语种的发展崛起,外语专业人才成为人类文明互鉴的纽带。针对当前非通用语种语言学教材的出版短缺问题,出版社应立足问题导向,摸清我国各高校非通用语种的建设现状,打造出版社与高校的产学研合作模式。各高校应积极鼓励中外教师共同编写或改编教材,解决部分非通用语种专业本土师资力量薄弱的现实问题。结合非通用语种专业的课程标准与培养目标,深入做好市场调查,充分了解各非通用语种学习者的需求,尤其关注学习者对相关语种语言学教材的难易接受度;在引进国外原版教材与出版本土化教材时,加大审核力度,考虑不同水平的受众人群,形成循序渐进、知识与文化融合、理论与时代对接的语言学教材体系。与此同时,开发多语种教材前要从国家语言传播导向、现代教育思维、教材体系、市场需求等方面做好宏观统筹和顶层设计(滕连帅 2017),紧跟国家语言能力建设脚步,努力确保语言人才的“国家利益开路先锋”角色与担当(文秋芳 2016)。

3. 结语

新文科背景下语言学教材建设困境与优化路径的相关探讨对落实新文科理念、完善语言学教材建设、助力复合型高端外语人才培养具有现实意义。当前我国语言学教材建设的困境突出表现为:新文科系列教材规划滞后、交叉应用特色待深入、本土开发与引进失衡、数字技术赋能程度低、非通用语种教材紧缺。鉴于此,未来新文科语言学教材建设应致力于打造精品、交叉应用、完善体系、加强外译、数字赋能、创新模式、覆盖语种、深化合作等工作,构建目标明确、供求平衡、体系完备、持续发展的教材建设生态。

参考文献:

- 范军. 2021. 新文科与大学出版[J]. 出版科学(6):1-19.
国家教材委员会. 2020. 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 年)[EB/OL]. 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jyt_2020n/2020_zt04/baodao/202004/t20200409_441835.html. [2021-02-04]

教育部高等学校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专业教学指导分委员会. 2020.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教学指南(上):英语类专业教学指南[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鞠玉梅. 2007. 关于高校英语专业语言学课程教学的思考[J]. 外语与外语教学(8):31-33,50.

雷鸣,韩焯. 2018. 场景视阈下高校教材出版转型策略研究[J]. 现代出版(5):35-37.

李克,李淑康. 2008. 高校英语语言学教材的建设与思考[J]. 外语界(6):81-90.

梁颖. 2020. “教学研究-策划出版-营销推广”一体化的教材出版研究[J]. 科技与出版(6):75-78.

刘超. 2020. 新时代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数字教材开发与出版[J]. 中国出版(7):27-30.

刘晓嘉,范军. 2022. 新文科的道器之思与大学出版[J]. 中国出版(7):5-11.

麻彩霞. 2020. 编写有民族特色语言学教材的几点思考[J]. 中国大学教学(2):110-112.

慕玲. 2018. 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布局的五个维度 [J]. 中国出版(11):64-68.

施春宏. 2010. 面向第二语言教学的语言学教材编写中的若干问题[J]. 语言教学与研究(2):1-9.

苏莹莹,董希骁. 2021. 我国高校非通用语种专业教材建设的问题与对策[J]. 外语教育研究前沿(4):77-83,95.

滕连帅. 2017. 国际汉语教材编写出版的历史演进及启示[J]. 现代出版(3):52-55.

王松. 2016. 现行语言学概论教材的若干问题[J]. 语文学刊(外语教育教学)(3):160-161.

王伟. 2019. 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成果(2010—2016)引用分析[J]. 情报资料工作(5):13-16.

王扬. 2004. 高校英语专业语言学课程教学初探[J]. 外语研究(5):57-60.

文秋芳. 2015. 构建“产出导向法”理论体系[J]. 外语教学与研究(4):547-558.

文秋芳. 2016. 国家语言能力的内涵及其评价指标[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23-31.

吴迪. 2020. 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下图书版贸工作探析[J]. 传媒论坛(7):87-89.

杨延宁. 2017. 语言学导论教学重点的调整:一项基于新中两国对比的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4):6-33.

张冰越,杨海平. 2020. 我国高等教育出版数字化转型路径探究[J]. 科技与出版(12):61-65.

张雪梅. 2019. 新时代高校英语教材建设的思考[J]. 外语界(6):88-93.

周粟. 2020. 高校出版视域下“新文科”的建设现状、面临机遇与发展趋势[J]. 艺术设计研究(3):121-126.

周永健. 2019. 传统文化通识教材出版的问题与对策[J]. 中国出版(17):47-50.

庄红权. 2020. 新技术条件下教材的升级与转型研究[J]. 科技与出版(7):56-61.

宗俊峰,刘志彬. 2021. 新时代大学出版社高校教材出版的思考与展望[J]. 现代出版(3):49-54.

Cépeda, P., H. Kotek., K. Pabst & K. Syrett. 2021. Gender bias in linguistics textbooks: has anything changed since Macaulay & Brice 1997?[J]. *Language* 97(4): 678-702.

Cunningsworth, A. 1984. *Evaluating and Selecting EFL Teaching Materials* [M]. London: Heinemann.

Ouyang Jinghui & Jiang Jingyang. 2019. What makes a good quantitative linguistics textbook?[J]. *Journal of Quantitative Linguistics* 28(1): 39-49.

收稿日期:2022-11-19

作者简介:王乐,博士,教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生态语言学。王骁涔(通讯作者),博士生。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

(责任编辑:付满)

(上接 34 页)

debates and English panel interviews[J]. *Discourse Studies* 9(3): 341-363.

Kiyimba, N. 2020. “I belong to the days of the dinosaurs”: extreme case formulation in therapeutic practice[J]. *Qualitative Psychology* 7(3): 384-397.

Lawrence, S. G. 1996. Normalizing stigmatized practices: achieving co-membership by “doing being ordinary”[J].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29(3): 181-218.

McCarthy, M. & R. Carter. 2004. “There’s millions of them”: hyperbole in everyday conversation[J]. *Journal of Pragmatics* 36(2): 149-184.

Norrick, N. R. 2004. Hyperbole, extreme case formulation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36(9): 1727-1739.

Pomerantz, A. 1986. Extreme case formulations: a way of legitimizing claims[J]. *Human Studies* 9: 219-229.

Potter, J. 1996. *Representing Reality: Discourse, Rhetoric, and Social Construction*[M]. London: Sage.

Robles, J. S. 2015. Extreme case (re) formulation as a practice for making hearably racist talk repairable[J].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34(4): 390-409.

Sacks, H. 1992. *Lectures on Conversation*[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Stokoe, E. 2012. Moving forward with membership categorization analysis methods for systematic analysis[J]. *Discourse Studies* 14(3): 277-303.

Whitehead, K. A. 2015. Extreme case formulations [C]//K. Tracy, C. Illie & T. Sandel. *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New York, N.Y.: Wiley-Blackwell: 579-584.

Wong, J. 2000. Repetition in conversation: a look at “first and second sayings”[J].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 33(4): 407-424.

收稿日期:2022-10-02

作者简介:马海兰,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理论语言学。黎曜玮,硕士,助教。研究方向:计算语言学。郭遂红,硕士,教授。研究方向:外语教育与教学。

(责任编辑:张蕊)